

=====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一五）·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八三期（zk1907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劫后反思】	以忏悔唤回人性良知（上）	樊思清·孙怒涛·孙毓星
【读史笔记】	读《王大宾回忆录》随想	徐海亮
【生逢乱世】	从红到黑，从黑到白	魏晓台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劫后反思】

以忏悔唤回人性良知（上）  
——樊思清从犯罪到忏悔的心路历程访谈录

· 樊思清·孙怒涛·孙毓星·

访谈日期：2017年6—12月

访谈平台：三人微信群

访谈人：孙怒涛、孙毓星，孙怒涛整理

被采访人：樊思清，清华大学动农系70届学生。因在百日武斗中开枪打死对立派学生朱玉生，被判刑12年。2016年5月23日，在清华百人校友群里实名公开忏悔。

目录

- 一、家庭背景
- 二、学生时代
- 三、文革初期
- 四、武斗杀人
- 五、留校改造
- 六、监狱服刑
- 七、回归社会
- 八、忏悔反思

▲ 孙怒涛：樊思清校友，你好！你本打算在2016年4·22聚会的“文革反思与清华”座谈会上公开表示忏悔。因聚会被有关方面强行禁止，你改在5月的网上讨论会上发布了《我要忏悔——直面我失落的人性》的忏悔书。在讨论时，众多校友对你的真诚忏悔表示了热情的鼓励，充分的肯定，高度的赞扬。你也积极与大家互动交流，诚恳地回答每一个问题。讨论氛围是友好善意的。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在讨论会上，有些校友还有一些疑问想提出来，但怕你一时难以作答。你有不少话想说，也怕说得不合适，被校友误解为忏悔态度不够真诚。

为了弥补这些缺陷，我邀请孙毓星校友利用微信平台对你作一次网上访谈，把各自的心里话都讲出来。

▲ 孙毓星：你好！樊思清。在网上讨论会看到你的《我要忏悔——直面我失落的人性》，我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深知对你而言迈出这一步是多么艰难，所以更为钦佩你的真诚与勇敢。

同样不可或缺的是，清华校友们历经多年反思创造了比较宽松、坦诚、和谐的环境氛围。我们感谢这些亲爱的校友和朋友。我愿意与老孙学长一起与你作更深入的交流，说说心里话。

▲ 孙怒涛：我和孙毓星都是清华文革的亲历者，我们很愿意与你推心置腹地一起交流、探讨、分析、反思。巧的是，我与他又都姓孙。（下面简称孙）

▲ 樊思清（下面简称樊）：多年来，我只在内心经常回放我那段不堪的历史，从未对外暴露过。因为这需要合适的契机，也需要信得过的知己。感谢两位学长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宽松友善的访谈平台，让我有机会梳理几十年的思想，袒露我的内心隐秘，说出我想说的心里话。

我们就开始吧！

## 一、家庭背景

▲ 孙：请你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家庭。

▲ 樊：我在1946年生于四川重庆歌乐山。抗战胜利后我们家搬到南京。小学时我在南京、中学时我在武汉就读。我家庭的迁徙是跟随着父亲工作的单位走的。

我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水利部部聘高工，在长江流域工作了一辈子。母亲是小学教师，也是大学毕业。父母都是长江水利系统的职工，我是在大院里面长大的。大院里有学部委员等多名高级水利专家，还有原国民党水利厅厅长。第二代人里面，名牌大学毕业的很多，也有清华的。作为中小学生，我从小满脑子想的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母亲对我进行启蒙教育，她既是我妈，又是我的小学班主任。1950年9月开学，当时母亲所在的小学里没有幼儿园，她就把我“放”在她当班主任的那个班上。我“花费”四年，读了两年小学一年级，两年小学二年级，才许我正常升级。

由于抗日战争动乱，我的父母是晚婚，母亲33岁才生我这个大儿子，可以想见到父母对我是宠爱有加。生长在这样一个大院和家庭的环境里，受的苦不多，满脑子想的和追求的都很单一，就是好好读书，以后上个好大学。

我的父母都不是右派分子，也不是共产党员。我母亲从小就对我说过，她同班同学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她自己永远是中间派，哪边都不参加、不亲近。我的母亲在她的学生时期是个中间派，但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还是没有能够逃脱挨整的厄运。虽然没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从此得了精神分裂症。父亲对反右斗争产生了恐惧，为防止有人追究我妈的社会关系，赶紧改了我的姓名。因为我的名字是北洋政府的一个大官给我起的。我对改名的印象极深！这是我少年时代留下的第一次政治运动阴影。

作为水利工作者，父亲常年在长江流域各处出差，回家很少（一年两三次），所以患病的母亲经常孤独无助。我中学时代的六年，就是在陪伴精神病母亲的状态里度过的。我在做作业读英文的时候，多半跑到离我家很近的一个寺庙里去，常常是和尚一边念经，我一边读英语。母亲患病以前，的确多次教育过我如何做人，讲过很多有益有趣的故事，现在想来，我并没有听进去。由于当时“如何做人”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我的功课取得好分数，所以我没

有认真考虑过“如何做人”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很无知，更谈不上有意识地去践行。经常出差的父亲，也忽略了对我的全面教育。

从小长大，“不重视人文学科，只亲近自然科学；不学着好好做人，只埋头读数理化”是我上大学以前的真实写照。

## 二、学生时代

▲ 孙：请你再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学生时代，好吗？

樊：我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接受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印象很深。如战斗英雄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烈士，放牛娃小英雄王二小，苏联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保尔·柯察金、高尔基、米邱林等等。也接受时事政治宣传的教育，如反对“一贯道”，镇压反革命。

到了中学里，我脑子里面开始想点事儿了。那时印象最深又最想不通的主要有两件事：

（1）大办钢铁，把楼梯铁栏杆用大锤砸下，回炉熔炼后又重新浇铸成铁锭。（2）我遇到的右派老师个个讲课精彩，教学水平高。我看见他们文质彬彬的，不太像坏人，可是成天打猪草，扫猪圈，还挨批斗被体罚，甚至老婆离婚，儿女划清界限，命运多舛。对这些我佩服的右派老师，我内心极度同情他们。只是当时什么也不懂，不敢说。我父母虽然不是右派分子，但都受到了冲击。

我们刚入大学，学校组织新生参观反右展览，印象深刻。但我实际接触到的许多右派分子，都是水平很高的教授和老师，我打心眼儿崇拜和喜欢他们，例如教我们基础课的某些老师。回想起来刚进大学时我的确很天真。很多同学通过反右展览，思想有触动。但是我却对反右展览没有什么感觉，在政治思想上无所触动。我在兴趣上注意去追求的都是清华教师的业务水平，以及生活中的传奇色彩。在想象中去模仿，以至于在日常生活或行动中经常表现为逞能，好勇斗狠，冒充英雄好汉；很幼稚，弱智。记得有一次我约了几个同班同学，在冬天结冰的时候，跳进清华泳池去“赌狠”，“耗时间”。我这样做时，从不考虑他人：“大家和自己都有风险”，“出了危险以后，学校会有责任，父母会多担心”！今天想起来，自己的确很自私，至少也是只顾自己高兴，只图自我表现。所以我进入大学以后，行动上莽莽撞撞，思想上糊里糊涂。一句话，就是自私，不计后果不考虑别人。很多同学比我清醒和懂事得多。

进校不久，就碰上“九评”学习。校党委艾知生副书记在一次对学生作报告的结尾，针对他自己的报告提出了一个问题：“给同学们思考，苏联出现修正主义是不是必然的？”。为响应艾书记的报告，我在班上讨论发言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如果苏联出现修正主义是必然的话，那中国也必然会出现修正主义？”。这问题被人记录下来了，但没有批判。

在随后的联系自己清理思想中，我也对政治课老师、辅导员暴露自己的“活思想”：我在看了维纳的《控制论》以后曾经：（1）“误认为”每一个“以个体存在的人”都属于“非常复杂和高度统一的系统”；（2）“误认为”人不自私就违背了《控制论》中的“高度统一的系统”；（3）“于是误判”人不自私是不可能的。

当时我是为了批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把以上观点作为批判的对象主动挖掘出来的。接下来我就开始准备对这个观点进行批判，但没来得及完成。可是到学期末了的时候，我的政治科目莫名其妙的得了三分。我从来没有得过这样差的分数！从此我在班上被划进了落后学生的行列。我的出身本来就不属于红五类，我的思想开始变得消沉和灰溜溜。我对政治课和政治辅导员都很头疼。既想靠拢又想躲开，不知所措。不暴露活思想不行，主动暴露加以批判也不行。联想起那些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我对政治辅导员也产生了反感。我认为他们属于“整人的人”，他们因为打击了右派，就把自己变成了左派，因而他们政治前途好，家庭生活幸福。他们和右派反差多大啊！

大学期间，我碰到了“一个包子，一次舞会”的事情，导致我相信某些领导已经变修，是“走资派”。

一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我住的大院里，我亲眼看到院里最高领导人的儿子（我的发小朋友），吃饭时把吃不完的包子扔在地上！当时全中国几亿人都在挨饿！所以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刻骨铭心。还发生了干部子弟在自己家里玩枪走火，以致伤人、死人的事情。正是由于这些事情，使我后来真相信他们都是“走资派”的论断。所以在文革中，当清华园出现了中学的干部子弟趾高气扬地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时候，我联想起高干子弟把新鲜的包子扔在地上的事情，进一步确信：很多干部的确变修，的确成为“走资派”了！

二是1965年的一天，我父亲到北京出差住在水利部招待所，我星期天去陪他，与他同住一个套间。结果在半夜12点左右这个房间里加了一个小伙子。他告诉我们：他是人民大会堂的厨师，刚做完夜宵，明早还要上班，回家太远不划算，在这儿睡几个小时。后来招待所又来了一群漂亮的女青年。原来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刚刚为中央领导人举办了一次舞会，有很多年轻漂亮的文工团女演员陪他们跳舞。这种事儿我第一次听说和看见之后，还想了半天，摇摇头，眨眨眼，不敢相信！最后感觉很震撼。虽然闷在心中从不敢对谁说起，但却牢牢记住了“他们的资产阶级法权好大，好隐蔽”！当时全国老百姓很少跳舞，很少举办舞会，甚至于听都没听说过。这种印象的确是后来导致我很快相信，“他们已变修，是走资派”的催化剂。

### 三、文革初期

▲ 孙：每个清华学生都有各自的大学生活。你这届同学，对参观反右展览和参加九评学习印象深刻，对你的影响也比较大。不过，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与大多数同学一样。

你在文革初期的情况怎么样？

▲ 樊：1966年，文革开始了，当时满校都是大字报。

6月19日，那天薄一波来清华看大字报时巧遇蒯大富。他们辩论时，我距他们只有4米左右。我第一次看到蒯大富，一口比南京话更硬的苏北话，对薄一波却没有留下印象。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大首长是薄一波。后来我在班上绘声绘色地谈起过我亲见的“薄蒯对话”，把蒯大富描绘成机智和幽默的人。于是我在班上被视为是蒯大富的支持者。

那些天我在清华园里到处看大字报，偶尔也写它一两张。慢慢地我感觉到班上的工作组对我注意了，态度也越来越严肃。7月6日，蒯大富写出《向党、向全校革命师生承认和检讨错误》的这一天，我已经被我班的工作组作为重点学生，由我班上的两位同学“陪伴”着到大礼堂去听蒯大富作检查。

会议开始，鲍长康、刘泉先认错了。之后，绝食多天的蒯大富病恹恹地出场。从蒯“假装要检讨”到“当场反口”的那一时刻，我的第六感官告诉我：重点学生们的呼吸和表情明显发生了“同步共振感应”。正是这一天听蒯假借检查之机，行控诉和反击之实，才开了我的眼界，当场就对蒯的精神佩服之至，有极大的崇拜感！这一天几乎完全决定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以至于整个这一生的命运。估计去大礼堂的重点学生都受到了被蒯大富鼓舞的反向教育。过去佩服右派分子不如今天佩服蒯大富。我没有说出来，但已潜入我的思想。

随着运动的深入，逐步认识了好几个那天去大礼堂听蒯大富作检查的重点学生，都是工作组认为问题比较严重的人。上大学以后经过反右展览，这时自己感觉工作组已经把我当成未来的右派分子对待了。我没有什么政治经验，也没有任何人对我教育和指导。当时只觉得很孤单，害怕。右派分子的可怜下场，也活生生地印刻在我的思想深处。我不知道找谁去诉说，更不知道如何解开这个心结。我马上面临的可能就是同样的可悲下场。

因为“一个包子，一次舞会”的事情，我相信这些当官的已经成了走资派。我深信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肃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腐化堕落的领导干部。

我还想，如果文化大革命重复1957年反右斗争的结局，我就会是一个可怜而凄惨的右派分子。我有一种害怕秋后算账的恐惧。

再加上我对蒯大富硬顶工作组的勇气非常佩服，周恩来总理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为蒯大富平反加强了我对蒯大富的信念。工作组撤走以后，我就成了井冈山战士。在然后团四分歧中，我成为坚定的团派就是很自然的选择了。

我相信“大翻个”的理论是正确的，我对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的口号深信不疑，相信文革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害后，团派广播台反复宣传，一再强调和鼓吹使用暴力，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我深信，要革命必然是暴力的，流血的。团四两派的冲突升级并没有惊醒我，反而是一头扎进了武斗的深渊，

#### 四、武斗杀人

▲ 孙：下面我们谈谈武斗的话题。

你在忏悔书中已经很详细地讲述了你参加的百日武斗，特别是你开枪打死朱玉生的细节和思想活动。但是不少校友总是不明白，你如何下得了手把同学打死。

对你来讲，这个话题很残酷很沉重。

我不得不问，不仅是因为校友有疑问没有解开，更重要的是，想通过事件的分析，能够找出一些对后人有益的教训。这点请你理解。

你能否先介绍一下当年你所感受到的武斗氛围？在忏悔书中已经介绍了的可以简略一点。

▲ 樊：我有责任解答校友提出的任何问题。能否让大家满意我不能保证，我能保证的一定会实事求是。以我惨痛的教训为后人所鉴，这也是我的心愿。

武斗是一步步升级的。团派的一个行动会刺激414以牙还牙，414的一个反击会刺激团派以血还血。

1968年的4月23日，百日武斗爆发，在旧电机馆打得难解难分。我回宿舍时途经那里曾驻足观看了一小会儿，并没有参与进去。其后两派同学争夺和占据宿舍楼，部分同学居无住所，彼此怨恨增大。

4月27日，四派的姜文波跳楼惨死，距离我住的2号楼宿舍门口不到20米。

两派交换俘虏那天，我背靠清华老邮局警戒，突然被一个老四从邮局窗户伸出来的长矛刺中后腰。幸亏有举重用的腰带护身才没负伤。

4月29日，在九饭厅前发生的冲突中，四派的谢晋澄惨死在车轮下。

5月15日，四派的孙华栋在一教被活活打死。

5月30日，团派的许恭生、段洪水在武斗中死亡，马跃开、时作隆重伤。他们的死伤对我刺激很大。四派的卞雨林也死亡，清华园内伤死消息频传，武斗杀气蔓延，阴霾笼罩。以上这些恶性事件中，两派互有伤亡，气氛越来越毒化，仇恨越积越深。

我参加了团派总部组织的对许恭生、段洪水两位“烈士”的追悼会。我父亲来学校催我回家，正好他也参加了，看到追悼会场景，他也不再催我。马跃开脑部受重伤成为植物人后，住在荷花池附近的病房，我至少两次去看望过他。我亲眼目睹了武斗后团派重伤和死亡人员的悲惨，团派死者家属在追悼会上呼天抢地，意欲雪恨！仅这一天武斗复仇毒气熏来，我晕乎乎充足了参与复仇的意气。

我与许多老团一样，深信团四两派的斗争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对414打死打伤我的战友义愤填膺！

就在我开枪的前几天，6月30日，被围困在8号楼的老四突围撤向科学馆，一路受到老团的前堵后截，在大礼堂东南侧发生一场混战。老四往老团扔了土手榴弹（有一种说法是老四把老团扔过来的手榴弹捡起回扔了），把一个我熟悉的团派战友炸成重伤（后来右腿高位截肢）。我闻声跑出大礼堂，看到这些老四已经逃进科学馆，腿部被炸得鲜血直滴的战友被急送医院。

混战之余，我只知老四的可恨，没有看见所以也不会想到老四是抬着伤员在逃命，在无路可逃的情急之下才扔的手榴弹。而我能顾及的只是我们团派，他们也只想着4 1 4，且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由于亲眼目睹我所驻守的礼堂区域有团派战士负重伤，又亲眼看见对方躲进科学馆，仇恨越烈，促使身在现场的我愤怒冲顶。

这次冲突使用了手榴弹，老四中还有人拿出手枪威胁要开枪。冲顶的仇恨使晕晕乎的团派马上找到了借口：是4 1 4升级了武斗！

于是，总部下命令：包围科学馆，围捕扔手榴弹者，不许出入。

总部传口令：“可以开枪”，“出来就打”。

总部委员任传仲专门到大礼堂落实封锁科学馆的事儿，强调要抓住那个扔手榴弹的人；同时给大礼堂等所有据点配发了枪支弹药。

重磅任务押宝礼堂！“命令可开枪”+“配枪弹”=“实际上能开枪”。可见，在武斗的毒气氛之下：（1）团派和四派人员互动，（2）一线战士和后台指挥互动。这两种互动都只有单向指引功能：相互架秧子，指责对方，使武斗升级，更加逼近拼命。一线战士要复仇，后台指挥便促其升级。可见当时两派已经杀红了眼，4 1 4扔手榴弹把老团炸成重伤后逃进科学馆，这对守卫大礼堂的我刺激最直接，最鲜活。我的亢奋度是在毒气氛的最高潮中快速升级的。亢奋的“一根筋”和武斗现场实况紧紧拴在一起。说句实在话，当时趴在武斗一线工事里的战士，对后台指挥的命令——“包围和围捕扔手榴弹者”——并不是执行力的聚焦点！从执行心理学考虑，一线工事里的战士真正的执行心理重点在于：害怕对方在科学馆弹尽粮绝之际，再次用手榴弹开道，杀将出来！所以，“一旦有出来的动静就打！”的战术心态“拉了满弓”。我们的整个大脑完全失去了回旋的余地，不会有任何松动。

现在展开分析武斗毒化气氛，只是想说明并不是突然就想起要去开枪杀人的。公安机关在审判我们的时候考虑到这些因素，才没有通通枪毙了事。

武斗刚开始时就离开了清华园的同学谈起武斗，因为没有看见，也就想象不出后来的场景和气氛。所以在事后提起我们这些枪手，似乎都是那种不带任何情绪地、冷静地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专门瞄准同学打冷枪的冷血动物。

当然，在正确地追究我自己走向犯罪道路的根本原因时，还是应该也必须要触及自己“漠视生命的冷酷人性”，而不能强调任何其他借口。

▲ 孙：现在的清华学生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来，作为学校中心的大礼堂曾经是个武斗据点，闻亭上曾有一个武斗哨位。请你详细地介绍一下好吗？

▲ 樊：大礼堂是团派控制学校中心地带、包围4 1 4占领的科学馆的一个重要据点。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守卫大礼堂的也就十几个人。大礼堂的楼顶有两架大弹弓，常与科学馆的大弹弓互相对射“炮弹”（砖头石块）。

科学馆的前门被封堵了，用后门出入。监视后门的哨位设在闻亭西侧约二三米的小山坡上。那里有一块人字形的大石头，用装满土的草包垒起五六层，就构筑成简单的工事。工事与科学馆后门的直线距离约6 5米，有人出入，尽在监控之内。一支半自动步枪稳稳当当地架在掩体上，标尺定好，子弹上膛，保险打开，步枪处于随时可射击状态。只要一扣扳机，子弹就飞出去了。这样短的距离，很容易命中。在总部发布封锁命令的当天就建了工事。为了防备4 1 4偷袭，晚上还在工事前方约2 5米处偷偷埋了两颗手榴弹当作地雷，引线拉到工事处。因为晚上太暗，看不清前方，第二天在工事靠后处安装了一架探照灯，可以把科学馆后门这一带照得很明亮。

闻亭哨位采用三个人一组，两班倒值班。我这个组有我，还有一个实验员，一个中学生。一人持枪瞄准后门，一人控制探照灯的开关，一人管手榴弹的拉线。这三个岗位我们都是轮流值班，一般二三十分钟倒换一次。即便吃饭、上厕所也轮流，总有人持枪监视。

朱玉生出来的时候，正好是我持枪。我看到一个人影在后门晃动，想也没想，就朝着人影开了一枪。

▲ 孙：你说谁出来就打谁。你这是真枪实弹呀！你打谁，是很有可能打中，甚至打死的。你想过吗？

▲ 樊：我们做好了打枪的一切准备，只要有人出来就打枪。但是，真的没有想过要把人打死。而我这犯罪的一枪，就要了朱玉生的命！

▲ 孙：开枪以后，你怎么想的？

▲ 樊：由于探照灯很亮，我扣动扳机以后很清楚地看见人倒下了。才过了几秒钟，我的脑子突然惊醒了。我是不是打死了他？我极度紧张，对趴在旁边的同伙说：赶快把探照灯关了，让那个受伤的人爬回去。后来看见仍然没有动静，我又说：如果有人出来救，就不要再开枪了。我又紧张又害怕，趴在那儿又观察了一阵子。这时候，紧张的情绪转化成极度的恐怖。我不敢再直接面对杀人现场，要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地方守住，我独自一人回大礼堂了。大礼堂里空空如也，我顺势坐在一个座位上，独自一人，点起香烟，大脑里一片空白，不知想什么。接着蒯大富打电话来问了。我接听蒯大富打来的电话后，又焦急地回到闻亭哨位，那里的状况还是与原先一样，我又回大礼堂了。天麻麻亮了，我的心忐忑不安，又怀着焦急的心态回到了闻亭。天刚刚亮，科学馆里面414战士走出来了，共三个人，把倒地、带血、受伤的人抬了进去。我们都在观察。对方不顾危险，完全暴露在我们的面前，站立着在救人，把人抬进去了。我们没有再开枪，似乎还怀着恳切的希望，赶快把人抬进去。当天上午，414广播了朱玉生的死讯，我知道我闯了大祸了！我掉进了无底深渊！我心里害怕，大脑麻木，空口喝了一瓶二锅头烈酒，只有晕乎没有醉。。

▲ 孙：有校友问，要是科学馆里有你的兄弟姐妹，你还会开枪吗？

▲ 樊：我当然不会开枪。很可能，我也不会闻亭拿着枪监视、封锁科学馆。

问题是，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过科学馆里的人是我的兄弟姐妹，我没有想过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看待。

他们是我的同学，这我是知道的。但他们是老四，他们伤害了我们老团不少人。我心中对他们是有恨的。现在总部命令我们不准他们进出，谁出来就打谁。

▲ 孙：是呀，当你心里对老四充满了对立，甚至仇恨，要你把他们看成是你的兄弟姐妹是不现实的。当时你对蒯大富那么钦佩，那么坚决地一丝不苟地执行总部的封锁命令，要你枪口抬高一厘米也是不现实的。你当时的派性已经完全压倒人性。只有心里不愿意执行长官的命令但又不能违背军令的士兵，才会想到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既“执行”了长官的命令，也守住了做人的底线。你在那时还没有这样的觉悟。

▲ 樊：是的，我承认你说得对。

▲ 孙：在邱心伟、原蜀育编写的《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第361页上写着：（处于政治优势、军事攻势的团派总部）“针对下属武斗人员怕开枪打死人负责之事多次声明：‘打死人由总部负责’”。你也证实听到过“出来就打，格杀勿论”的总部命令。总部允许你们、甚至要求你们开枪，这对你的开枪有没有影响？

▲ 樊：应该说多少是有点影响的。要是总部不发枪下来，我也没有枪可打。总部把枪和子弹配备下来了，又命令封锁科学馆，不准被围困的人突围出去，所以开枪就变得是很自然、甚至是必然的事。

▲ 孙：我认为总部允许开枪、为打死人担责的命令打开了开枪杀人的“阀门”，对武斗人员而言，降低了对开枪杀人有顾虑的“阈值”。

假设一下，如果总部命令中限定了开枪的条件，譬如，自身无生命危险时不能开枪，或不准打死人，甚至明令打死人由开枪者自己负责，这样，武斗人员在开枪的时候就得掂量掂量能不能开枪，打死人后怎么办。那样，打死人的情况可能会避免，至少会减少很多。

▲ 樊：可惜总部没有这样的提示和限制。事后我想过多次，且不说“命令中限定了开枪的条件”，只要是谁口头提到“具体条件”，手拿武器的团派武斗战士，听到之后会有一半人突然因醒悟而有所约束。

▲ 孙：其实那时总部也已经认为与414的斗争是敌我矛盾，你死我活的，期望总部有这样的限定是不现实的。

你是枪手，当然要负直接责任。蒯大富作为总部一把手，发出这样的总部命令，同样要负刑事责任。他是害人害己呀！

樊：蒯大富也判刑了，武斗责任肯定是被判刑的原因之一。当年蒯大富面对清华万人大会的质疑，把他“可以开枪”的笼统命令，认了一个“具体的账”。蒯大富回答：（闻亭那一枪）“是我下的命令”。那时我已众叛亲离，仅剩自己孤单一人了，当然终身难忘！

当时我想：蒯大富敢说话，不含糊。今天我想：他当时，起码比后来下令向老百姓开枪，事后却不承认的人爽快。

尽管如此，对于我自己而言，还是应该去反思我该承担的责任。

▲ 孙：清华有一万多名学生，你是我们中的普通一员。按正常情况，你与其他同学一样，会按时毕业，参加工作，以自己的技能为国家效力。在大学阶段，不能保证没有过失，但不可能成为杀人犯。正因为碰上文革，好几位同学成了罪犯。显然，文革是他们犯罪最重要的原因。清华那时充斥着“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宣传，弥漫着“文攻武卫”的血腥，武斗人员已经杀红了眼。但是，两派参加武斗的有近千人，真正犯有命案的只有几人。为什么是你们几人犯了罪呢？很显然这里有个体的原因。

你认为是哪些个体原因使你犯了罪？

▲ 樊：就个体的原因，是意识和性格使然吧。

在思想意识方面，我在人文学科方面的知识学得少，受到的教育很少。只热衷于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我认为这是硬学问。而人文科学是软学问，学的人比较窝囊，很土。

在家里，父亲长期在外出差，母亲精神不是很正常，在人文知识方面无人交流。在学校里，对党团员比较反感，受到组织的帮助也很少。

因为幼稚，遇见了文革这样从来没有见过的运动就堕入了武斗的深渊。

另外一个是个人的性格方面。我有比较强的个人英雄主义，越是刺激冒险的场合，越有一种表现的冲动。尤其是见到蒯大富当年以一己之力对抗王光美工作组的不俗表现时令我更加冲动。

从根本而言，我那时丝毫没有尊重生命的概念，我甚至没想过这真枪实弹是会打死人的。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没有人性，只是一个忠实执行总部命令的机器人。

如果那时有人提醒一句：打死人是要偿命的，我可能会惊醒。

我班有位姓陈的同学是老四，他也参加了武斗。看到老四被老团打死，他激愤得要向老团寻仇。老四的头头但桑制止了他，提醒他杀人要偿命的，运动后期肯定要算账。可惜团派里没有这样头脑清醒的头头，而总部的命令是没有人性的“出来就打，格杀勿论”。



▲ 孙：你总结的你那时对生命很漠视，这一点的到位的。

具有你这样个性的人，不止你一个，也不止你们这几个人，可能有十几个或几十个人。也就是说，他们碰到如你这样的状况，也会成为杀手的。譬如，朱玉生出来的时间早一点或晚一点，正好不是你持枪值班，那么开枪的就不是你，而是别人。所以，你成为杀手也有偶然性的因素。

但是，武斗升级到这样的程度，不是你就是与你相仿的人一定会成为杀手。不是朱玉生就是另一些同学会成为被害者，这又是必然的。

▲ 樊：偶然性落到我的身上，对我而言，就成了必然。我要做的是寻找我成为杀人犯的主客观原因，而不是去强调偶然性。

▲ 孙：如果现在的年轻人碰到你过去曾经遇到的状况，如手握刀枪等致命武器面对民众，你会对他说什么？你希望他从你这里吸取什么样的惨痛教训？

▲ 樊：我会对他大声疾呼：“放下武器！武器是会杀人的！你杀死了他，他的妈妈会疯的！你杀死了他，你就成了杀人犯，你的妈妈也会疯的！”

我想过这个问题。我犯罪的这段时间，正是我对人的生命最冷漠的时候。如果有人对我这样提醒一句，有可能会让我惊醒。所以，只有用最感性最直接的方式去唤醒他心底的人性，才有可能惊醒他。

▲ 孙：你说到点子上了！人性是最能打动人的，如果他还有一点良知的話，要唤醒他的人性，在施暴之前住手。

我的提问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不时想起六四晚上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的军人，想起百姓在维权时遭遇到的那些凶残的军警，想起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可能会出现的社会动荡和群体矛盾。如果他们被某种政治正确的口号，如“镇压暴乱”、“爱党爱国”、“民族统一”等鼓动起来按长官命令执行任务时，我们要请这些人冷静地想一想，这些光鲜口号就那么正确吗？如果面对的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务必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当年我们就曾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样“绝对正确”的口号下视同学为仇敌，互相厮杀。而且被人欺骗，以为这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大开杀戒。这是我们血的教训，青春的代价，后来人务必要吸取的呀！

▲ 樊：你说得对！我完全赞同！

（未完待续）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

## 【读史笔记】

### 读《王大宾回忆录》随想

• 徐海亮 •

甲午年国内外发生许多事情，一些书籍出版，一些即将出版。国庆节我在深圳巧遇一件不大也不小的事——读到《王大宾回忆录》即将付印的清样文稿。对于文革期间北京地质学院的老五届学生来说，还是对于出版该书稿的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来讲，我都完全是一个局

外人，我对地院的文化革命史实，以及对于王大宾本人，都很不熟悉。但我却意外地在深圳通读了即将付梓的《王大宾回忆录》书稿清样。

该回忆录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66年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红卫兵受命并参与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前后全部事实：朱成昭领命—王大来不同意揪彭—王大宾接触彭德怀—王大宾认为当时不该揪斗彭—戚本禹批评地院的右倾—按总理指示王大宾等百人护送彭德怀进京。这一详尽的史实回忆与叙述，廓清了以往种种传言、网文留下的模糊印象。

过去虽然听说和见到好些地院同学的回忆，包括与地院“东方红公社”有密切关系的闫长贵先生的回忆、讲述，涉及到好些当事人，包括朱成昭。但这一次，我从王大宾完整的回忆里，较为准确地得知了揪彭的由来，地院学生的行动与过程，每一过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有关中央领导、地方与军队领导的言行，学生与彭德怀接触、交谈，对他的了解、认识，特别是地院学生在这—活动—中的心理活动。这些非常具体的史实，第一次由该回忆录全面披露，大家都可以从回忆录看到，就不赘述重复了。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从重新“理抹”（四川话）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的彭德怀、批判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切入的。加上66年春批判“三家村”与“燕山夜话”，当时在校的大学生，绝大多数都多少了解1959年前后党内国内发生过什么引起争议的事情，在公开或正式的场合，绝大多数人都认可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觉得他就是当时称呼的“三反分子”，属于敌我矛盾。这次文革运动，因一开始就祭反右倾大旗，不少内心有过对“三面红旗”模糊认识的人，在忐忑不安地跟上文化革命大批判的形势，极个别抱有投机取巧心理的人，试图在周围的人（包括群众，或领导者）寻找可称之为“右倾”、“三反”的揭露对象，择机发难。这种特别宽泛宏大而又极其微妙的心理冲动，没有经历过1959—1966的人，没有认真思考的人，决非可以凭借历史文献，或后世文人刻意渲染去体会和理解的。

甚至从批判《海瑞罢官》发起摧枯拉朽的反右倾声势，也触动着早期文革派领导人的心灵。湖北的王任重把自己曾在《湖北通讯》发表的两个读书笔记找出来，“审查一下，发现其中也有一些糊涂观点或者错误的观点”；于是将1962年读《资治通鉴》的读书笔记序言二则，重刊于《湖北通讯》5月14日增刊之上，并刊发署名短文“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王在短文中，说当年发表读书笔记目的是使干部增加一点历史知识，也为了“使干部懂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正确挑选干部，以及发扬党的民主的重要性”……不过，“现在看来，当时不写这种读书笔记，而强调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好了。湖北省委是一贯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但是那时还没有现在的认识水平”。陶铸同志则在中南地区的动员大会上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右倾言行作出自我批评。文革运动的左派领导人，也真被大家共同祭起的革命大旗吓了一跳。

和上述情况相反，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领受了揪斗彭德怀的指示，有了为革命立大功的机会以后，一些主要当事人却出现异常的反应。青年教师、系团总支书记王大来“认为不应该揪彭，并为此和（造反派原第一头头）朱成昭在电话中发生了争执”（该书48页）；因为王大来等与彭接触后，彭“豪爽、直率的性格，一下子就感染了王大来等人。气氛融洽，谈得投机……王大来将记录稿交给我，请我做决定，是否应该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汇报反映彭德怀现在的思想状况，说明彭德怀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批判刘少奇的，建议现在不应该再揪斗彭德怀”。（该书50页）王大来在房山县参加四清后，就要求并正式调到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了，运动初应学校要求回校参加文革运动。这里王回忆的是较为间接的资讯，即他回忆的王大来汇报内容，以及阅读王大来与彭总的三次谈话记录后的想法。

但王大宾自己的回忆则是完整与清晰的第一手的资料：

1966年12月18日，王大宾以地院东方红公社第二把手身份接触彭德怀，听说王是四川德昌人，彭一开始就回忆起长征时在大小凉山的经历来，王则讲到一解放，“我们山里的穷人就都知道你您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再就是您彭德怀副总司令了。十大元帅，朱老总第一，您就排第二了。”王大宾讲的，也就是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大学生普遍知识和朴素感情。下面谈话就转入正题，他们谈到庐山会议、三面红旗，“以及当时农村浮夸风的真实情况，我对彭德怀已是完全没有视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头子的警惕，而将自己亲历的所见所闻，自己的认识都向他和盘托出。”（55页）他俩心平气和地、坦率地交流了大量对以往基层问题的看法。王现在回忆：“我们都丧失了阶级警惕性，都不设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接着我们就谈起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饿肚子的事。”（59页）“我受到了鼓舞，越讲越有劲，也好像要在彭德怀面前显示自己见多识广似的，我一边喝茶，一边继续我的话题……”（61页）。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我思想上已经完全接受了王大来等人的意见了，对彭德怀充满了同情心。我决定要支持王大来等人的意见：不应揪斗彭德怀。”（65页）

年轻的读者可能会怀疑，革命大潮下，红卫兵领袖的王大宾当时能够有如此的清醒和水平吗？我相信王大宾的质朴，我相信当年的亲历者都会理解王当时的认识和心态。

第一，王首先是四川人，我们几乎同时在四川上中学，在李井泉治理下的四川，我们有同样的感受，王在我们心目中穷乡僻壤的“甘、阿、凉”大山农村长大，我在重庆都市长大，我们都听到和感知了那时遍及城乡的“怪话”——对四川农村形势的不理解或“右倾”情绪，那时不光是知识分子有牢骚，而且干部和工人也有“怪话”啊，也有人说“小资产阶级狂热”啊！重庆市就有领导向中央写匿名信告省委的状。就在地质学院学生接触彭德怀时分，成都街头上大字报已经公开揭发批判了李井泉在1958—1962年期间粮食、农村政策上的错误，对于这些问题，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在揭发，甚至一批地县级干部也在造反披露。

第二，从接触地院的师生和地院的一些文革资料以来，我始终感觉到地院的造反派学生，对于文革前的党内斗争、“前文革”问题——特别是社会问题的关注，不那么简单。他们不是一个王大来、王大宾和朱成昭如此，也不是就针对一个彭德怀问题，去接触了“右倾”“反党”分子，他们在四川还接触了诸如刘、张夫妇、“萧李廖反党集团”，为萧、李、廖奔走平反，把许多类似四川反对李井泉极左而获罪的领导干部保护在地质学院。我曾向闫长贵探讨个中原因，他觉得相比而言，地院同学多来自社会下层，对党内政治斗争涉及到的社会下层问题，特别敏感，反应强烈。我与地院的蔡新平同学探讨这个问题，他写信回答：“关于对彭德怀同情的态度问题，我从来不认为是个问题，虽然那年头我们还不知道普世价值这个词，但善良之心，同情之心，人道之心（那年头人道主义要加上‘革命’两个字才可以说）本来就是普世的。是非善恶，良心不泯，大有人在。我们这代人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凄惨苦日子，彭德怀庐山会议因何挨整我们当时并不知真相，如果彭老总把这事当面对你一讲，你只要是正常的人，我想一定会同情彭老总的。因此我相信，最早接触彭老总的王大来、郑文卿就是这样被打动的。后来过去的王大宾也有了同样的认识是不奇怪的。”

第三，实际上不单是一个四川，一个彭德怀。在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大潮里，许多本来是反右的运动，却偏偏冒出来群众反左的事情来。郑州“二七公社”的学生领袖党言川，他66年造反，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对他的人列举的一条罪状就是他1962年2月23日说“我们党中央在那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

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58—59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情况”。66年9月造反派大会批判前省委书记吴芝圃时，党言川仍然用信阳事件饿死二百万人来攻击吴芝圃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河南造反派在否定文革初运动方向时，首先批判前任省委领导极左错误，同情的是57年以来“反右倾”受害者潘复生等的“反党集团”。我大学毕业刚到河南，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个造反头头就专门告诉我：“河南最可怕的就是极左了”！河南大学生多来自工农家庭，他们亲身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的种种灾难，怵目惊心、难以忘怀。发人深省的是：文革从批判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开始，河南文革，竟然与批判大跃进极左相关联，甚至最初运动的发动，居然是群众性反极左，而非反极右。康生在河南代表汇报问题时，一再点出党言川有“反动言行”；连支持造反派的纪登奎，每到要敲打造反派的关键时刻，总要念念紧箍咒，说他有历史错误。不仅如此，河南为武汉“钢二司”及“新华工”提供了四个豫籍红卫兵司令，或许是河南前文革历史的某种深沉的文化回响？类似对过去运动的反思、言论，乃至向中央部门和毛主席上书者，在一些地方的造反大学生身上屡见不鲜。有的甚至被视为“反动学生”。

“奉旨造反”一度成为文革研讨中时尚的词汇。在王大宾的回忆中，我感到这一时尚概念似对又不对。讲对，因为地院学生确实响应了文革运动，当时确实是按中央领导的指示，把“反党分子彭德怀”护送回北京，交北京卫戍区了，尽管他们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内心（至少是一部分主要头头的内心），是同情彭德怀的，他们尽了努力，去保护、抚慰彭老总，参与护送的百名同学，没有一个违反当时的党纪国法，去欺凌弱勢的。这一事实和今天脸谱化去谈红卫兵青面獠牙，去研究文革，是大相径庭的。朱成昭同学看到带回京的彭德怀材料抄件，“抄后即在北京红卫兵总部核心小组间传阅了。这样很快就在地院出现了一股为彭德怀鸣不平的‘暗流’”。（86页）而且在67年元旦后，王大宾就在老干部李贵家里召开各联队核心成员会议，汇报了揪彭的情况。李贵和参会同志都同意——当时不应该揪彭。这样看，地质学院造反派核心同学，按中央指示和组织纪律要求揪走、护送彭德怀到京，但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没有完全“奉旨造反”，他们理解了彭，他们尊重历史，没有不尊重彭德怀的人格。这些都是我们相信的历史事实，决非文革后彭总被平反，才对自己的评功摆好。

有意思的是，中央文革明明知道东方红公社的核心同志对彭德怀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依然确定了主持揪彭的王大宾担任公社领导人。而造反头头朱成昭被整肃，则是因为超越了同情彭德怀的其他原因。

周恩来还指示李先念副总理，拨款8万元到地院，支持地院东方红公社保护来京避难和反映问题的各地领导干部，67年春，总理、康生和戚本禹在大会上还表扬地质学院，鼓励他们要像梁山好汉那样讲义气呢！

如果后来的人知晓1958—1962年的高中、大学生当年对于国内形势有过什么讨论，如果知道大学生在城市社教、农村四清，以及批判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学习中，他们曾经历过的“清思想”与自我检查（好些自我检查又被记入档案，成为文革中整学生的黑材料），就会明白王大宾们“逆文革大潮而动”同情彭德怀的背景了。笔者在大一时因试图上书毛泽东言事，文革初被打成“上万言书”的反革命右派，所以注意到不少文革的典型“问题大学生”，都有探讨以往社会问题的经历，又多以左或右的形式表现出来。对应现在研讨中把文革中人性说成一片黑暗、绝对丑恶的倾向，我觉得文革现实中的种种人性冲突、人性光辉的事例并不少，在思考红卫兵领袖与普通人文革中自我心理的冲突，革命理想和现实人性的冲突，就不能不想到雨果《九三年》里的郭文、西穆尔登，想到是否存在我们批判过的超越革命名义的人道主义？这种联想本来是无意义的，1793年的法国毕竟与1966年

的中国是两回事。但王大宾们显示的人道，就是最典型的案例，他们的人道主义既是针对彭德怀的，也是针对中国老百姓的。

我与王大宾认识的很晚。2009年我去看地震后的都江堰，当地政协副主席、商会会长——颇有都江堰市“小旋风”气度的彭伟接待了我，并结识了在此安度晚年的王大宾。作为工科出身的他，不苟言笑，仿若凉山苍松。这是文革前的学生干部，好学生。可能饱经风霜吧，看起来他比我认识的好些老学生干部，还要朴素，更象山里人。彭伟讲王不太愿意回忆文革，或者心有余悸，不愿去写文革记事。但是那一天我住在该市，大伙走了，王却不愿离去，他似有触动，话匣子打开，侃侃而谈文革经历，收不住嘴啦。今年国庆后，王大宾得知我读了他的回忆（在1982年湖北看守所的自我检查、交待基础上，开始的正式回忆与写作），就打电话给我，一再问我有什么意见，书稿有什么问题；说“一再”，是我后来几天在太行山里盘旋，他接连打电话来征求意见，那里信号很不好，我又在汽车上，什么也说不清楚。我感到他有一个“临盆”前的紧张心理，这是他几十年来在社会第一次公开“亮相”的处女作吧，他有什么担心，忧虑别人对文革中的自己不理解？他反复需要给我说明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他需要强调，自己是犯了错误的，在文革中是干扰了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部署的。我明白，不需要像祥林嫂那样逢人就讲不该把阿毛给狼叨走啦那样去忏悔。现在人们看起来会奇怪，他为什么有这么沉重的心理负担？人们会说，文革压根儿就错了，你那么自责干嘛？或者，你值得做文革和毛泽东的殉葬品吗？不是，王大宾在根本上是尊重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尊重业已发生的历史的。他只是作为一个虔诚的老大学生，愿意承担他本应有的那一份责任。他认为对于文革运动，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自己的那一份责任，而不是只去谴责毛泽东。他在1983年武汉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中的陈述，已经表达了“在运动初期，我犯了许多错误，有的错误是严重的，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损害，很早我就深感内疚和痛悔”。（200页）这不是在法庭上不得不讲的空话，他一直恪守了自己的承担。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他不应负法律责任，另一些问题，他必然要终生体验、反刍，提升。

我注意到他对毛主席1968年7月28日召见谈话的逐步认识。这一次毛泽东召见所谓五大领袖，在当年高校和社会上确实引起巨大反响，我们作为“事外人”，当时也是五味俱全，心里很沉重的。但是到今天，和其他同龄人相比，王大宾有他独到的体会。他一再强调是毛主席召见，不是接见。“今天回想起来，当年的我是何等的幼稚，何等浅薄，竟对毛主席这次谈话后就是我们厄运的开始的真谛浑然不觉！”（162页）他引证了谢静宜新近出版的《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涉及七月事件内容，谈透了事先不给蒯大富打招呼，刻意去捅“马蜂窝”的问题。当然，也可能这是他直到读了谢静宜揭开的内幕，才彻底想明白的问题。而这也是不少想问题的人，直至今天还没有想通的重要问题！王大宾在公示这一回忆时，是认真的。他指出“实践证明我们没能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165页），而且在时间上，他追溯到1967年，“作为当年东方红的一把手，我一直深感愧疚”。（165页）“我们北京高校的头头，的确都让毛主席失望了。文革运动的实践证明我们不行……”（166页）文革高校的头头们，要简单化地把他们斥责为“反革命”显然是政治的低能和有失公道的，要他们自己承认自己“不行”，也是非常困难的。可能，他们当中，内省达到王这一步的，并非很多。不少人还在怪这怪那，还想指责别人，唯独不去反省自己（乃至有人以为自己比党和毛泽东还高明呢）。我终于明白，因为我成了该书付梓前夕的第一个读者，王大宾一再打电话，就是要我明白他反思的诚意，文字有无问题？他在法庭上的陈述，他的回忆，都不是不负责任的虚伪言谈。

回忆录最后，“我生命中的两个女人”，收入了王大宾前妻的记忆段落，我觉得这是本回忆录中非常触动人性的一段。我喜欢在观察历史与社会中，思考一些涉及人生和人性的小故事，我也一再见到因“文革罪案”身入牢狱者的亲人眼泪和坚强活下去的，我自信阅历和

亲历，我有坚定的自持力，能面对这大千世界跌宕的人生，但仍不得不为我们那一代人的遭遇，为我们那一代——特别是女同志支持的自强不息和细腻心灵表述打动，热泪让我无法再读下去……

本来，我是为了解我不熟悉的地质学院历史去读这本回忆录的。但我感到却有意外的收获，朴素本分的王大宾，直白地披露了自己心路历程，书中有许多细腻的——包括他接触到的干部和学生的实际心理反映，用简单化概念化谴责文革的“大排档文字”，无法表达出来，也无可理解。可能在那凉山沧桑的木讷下，还有着我未曾理解和读到的心理活动。

希望从王大宾个案开始，我们能够借鉴心态史学和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回头来看看那似乎已经消逝的历史——大家热衷的政治史。

□ 原载张运钧、李颖编《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  
~~~~~

### 【生逢乱世】

#### 从红到黑，从黑到白

• 魏晓台 •

父亲魏文伯，192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考入北平郁文大学政治科。1930年6月任中共北平市委秘书长。抗战爆发后，在新四军皖南根据地坚持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民运部部长、秘书长等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司法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华东局秘书长、华东局书记。文革中，被打成“叛徒、走资派”，残酷迫害十年之久。文革后复出，担任中纪委副书记、司法部部长、中顾委委员。1987年去世。

我记得“5·16”通知下发之前，我父亲到北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怎么搞。“5·16”通知见报（作者记忆有误，“5·16”通知在1966年5月发出后只是传达到一定级别的干部，并未见报，直到一年后的1967年5月16日才见报。——编注）之后的某一个晚上，他对我说，你跟我一起去交大。记得当时还有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杨恺和我们一起去交通大学。到了交大一个教室后，里面坐满了教职员和学生骨干。父亲对他们讲解了“5·16”通知的精神，以及如何理解、领会“5·16”通知的看法。这次传达大概进行了两个小时。因为这件事，父亲后来多次被拉到交大去批斗。说父亲歪曲“5·16”精神，想束缚教职员员工的思想等等，全是刘少奇的黑路线。

我们班里有一个同学叫张顺林，他出身小业主，很有文采。他的姐姐、姐夫都是共产党员，是个很不错的家庭。他很崇拜曹雪芹、郭沫若、闻一多等著名文学家和诗人，对这些人研究得非常深。不过，他不拘小节，口无遮拦。在学校老师的印象中，最起码是思想落后，或者思想不健康。“文革”开始后，有人将他在学校两年里说的那些话集中起来了，并报了公安局，定他是一个反动学生。1966年下半年，学校开了一个批斗会，还把他逮捕了，从此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人去了哪里。后来听同学说，1972年枪毙了一大批“一打三反”的反革命分子，有人看到张顺林被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拉去游街、游行，然后被枪毙了。“文革”中，枪毙学生很少听说，上海中学生大概也只有他一个（现在平反了）。

张顺林头发长长的，戴着黑边眼镜，样子有些颓废。他不大上体育课，就算上了，跑也跑不动，跳也跳不高，体育成绩都是零分。但他的字写得非常漂亮，文章也写得非常好。奇怪的是，他的作文，语文老师只给60—69分之间。我们的语文老师是特级语文老师。但他们两个就是搞不到一起，他看不起老师，老师对他也反感。

“文革”开始停课后，我就在家里。8月份，韩烽火给我打了电话，叫我晚上8点到湖南路8弄李彬山（警备区副司令）的家去开会。出席会议的人有韩烽火、廖年、张小坊等。开会的内容就是要筹备上海市红卫兵中学生总部和上海市红卫兵大学生总部。开完会没隔一两天，我们就住进了原来永安公司老板郭琳爽在淮海西路复兴路口的家中。当时有南洋模范中学韩烽火、廖年，还有后晓海；我还把李小龙、李小林、陈惠民都叫上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到各个中学串联，我负责杨浦和闸北这一块。因为时间比较紧，还给我们配备了4辆警备区的摩托车。摩托车就停在好八连的操场里，我们需要时就打个电话。

那个阶段，我基本上是白天晚上全在跑学校，一天至少要跑一二十个，因为离总部成立只有10来天时间。当时各个学校都有红卫兵组织，而且不止一个，我们必须一个个谈过来。谈的条件很简单，第一，保不保上海市委？如果是保上海市委的红卫兵，就可作为吸纳成为组织一员的条件；不保就剔除。而且每个学校原则上只选一个势力最大的；如果势力相当，且都是“保皇”的，就两个都选。那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路线上的分歧，只是“保皇派”和“造反派”之分。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我都在学校里转。每次都要登记好学校的名称、红卫兵的组织名称和联络人，并告诉他们，最近将举行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的成立大会；具体时间、地点以后会再通知他们。

“上红总部”成立前夕，我们从淮海路搬到了后来的上海市人委（也就是人民广场的人委大楼）。那会儿，“上红总部”组织已基本健全，我记得司令是南模（南洋模范中学）的李爱民；政治部主任是南模的韩烽火；司令部是南模的廖年；作战部是六十一中的张延平；保卫部是复旦附中的张小勇；我（复旦附中）在联络部；南模的后晓海在宣传部；后勤部是杨海光和陈代阳，他们都是淮海中学的；张小坊是办公室的。“上红总部”的组织基本上和一个军队编制差不多。当时住在人民广场的“上红总部”主要成员都来自南洋模范中学，组织的纠察队，也是南模的人比较多。

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成立大会是在晚上召开的，大概是9月12日。参加成立大会的红卫兵至少在10万人以上，整个人民广场都是满的。各个学校的旗帜排得很整齐，各个学校的红卫兵来了以后，就全部进入自己划好的线里。我觉得组织成立大会的整个过程，肯定是部队和原来组织国庆游行的那帮人帮着搞的。记得下面有一批人，专门负责管理这些事。当时参加“上红总部”成立大会的领导有市长曹荻秋、警备区司令廖政国，还有他们手下的书记、副书记、副市长、警备区的副司令。会开得相当成功，会开完以后，我们就常住在人民广场，主要的工作由韩烽火和廖年两个人负责。事实上真正负责工作的应该是3个人，廖年和韩烽火负责日常工作；后晓海负责宣传工作，《红卫兵宣言》等条例就是由他起草发布的。

红卫兵总部很快就结束了，大概就两三个月。原因是各个学校红卫兵组织越来越多，冲突也越来越大了；造反派也在期间逐渐崛起。第二个原因，红卫兵组织本身也是一个松散组织，加之成立得很仓促，没有很强的组织性。外加接待了到上海的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和中学生红卫兵两拨人，使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方式以及意识形态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我记得大专院校红卫兵是由谭震林的儿子谭怀远带队的。他们当时就住在我们旁边的体育宫里。我和廖年陪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梁国斌还去看望他们。当时北京红卫兵是来指导上海红卫兵运动，并介绍北京红卫兵的经验。除了北京红卫兵之外还有其他省市的红卫兵来

上海，事实上外地红卫兵到上海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抄家抄得特别厉害（真正的抄家是外地红卫兵带来的）。上海红卫兵那时候还没有抄家、打人这种事情。我觉得是外地红卫兵来上海来之后，上海红卫兵才开始跟风的。外地红卫兵带来的基本上是负面影响，而且上海市民对他们极为反感。

说个最典型的例子吧，当时的丁 XX 是大学生，回上海后，经常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当时的干部子弟都习惯说普通话。有一次他在人民广场因为看一个什么事情和别人吵了起来，没想到一大帮上海人就围住了他，一边说“你是外地的”，一边还要打他。他说“我不是外地的，我是上海的”，“是上海人就讲上海话”。他一开口说上海话，人家就放了他。由此可见，当时上海市民对外地红卫兵非常非常反感。

“上红总部”到了 1966 年底，就基本名存实亡。像韩烽火、我、后晓海等大部分干部孩子的家庭都受到了冲击。我们为了避嫌，也都离开了红卫兵总部。李爱民和廖年都是军干子弟，他们还没什么大问题，就在那儿维持总部的工作，但是他们也从人民广场搬到了徐家汇天主教堂旁边的天主教学院里。红卫兵运动消亡以后，徐汇区区委、区政府也搬到那里去了（红颜色，很大的两、三层楼的房子，现在是徐汇区检察院、反贪局）。之后，我还去看过他们一次。

当时各个学校去抄家抄到的很多物资，都送到人民广场的总部，由杨海光的后勤部保管。有人说杨海光贪污，还整他，其实根本就没这回事。在我印象中，所有抄家得来的物资封存以后，全部都交到公安局或者市有关部门去了，而且在搬家之前就上交了。

我开始不常见父亲了。偶尔一两个礼拜看到他一次，还不在家里，一会儿在西郊宾馆，一会儿在东湖招待所。市里领导干部之所以东躲西藏，就是想避开造反派的骚扰，够继续主持市委、市政府工作。我爸爸、曹荻秋叔叔和陈丕显叔叔当时还经常碰头，中央有什么指示、什么讲话，或者市里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一般都要到陈丕显叔叔（他因养病，市委、市政府一般由曹叔叔主持）那儿去汇报，让他也知道外面的情况。

随着“文革”的深入，上海也开始陷入了混乱之中：红卫兵串联、工人开始成立各个组织。印象最深的是，当初复员军人、临时工等，乘机要待遇，到处抓领导批条子。这些领导没下台之前，还掌握着批东西的权利。他们天天都被造反派“绑架”，因为他们是市里主管财经的领导。造反派把他们抢去，逼着他们批条子，苦不堪言。很多领导不被逼到没办法的地步，一般都不肯为他们批条子，或者尽量少批一点。造反派只要拿到一点东西就满意，反正用完了再绑架，和绑票没两样。不光市里的领导到处乱躲，底下各个部门的领导都一样。

1966 年底，我们基本上没什么事可干：家里没人，学校也不上课，只能去串联了。“康平路事件”发生时，我恰巧是第一次串联回家。因为上海市委书记处在康平路（简称康办），记得那时候“康办”全部被赤卫队占了，除了张春桥家和柯庆施家没有住人外，其他人的家里全部住满了赤卫队员。赤卫队进驻“康办”后，并没有任何抄家行为。他们为什么要进驻康办，我也搞不清楚。当时梁国斌的家就在我们家边上，我们两家的屋子都空着。我记得他们家梁伟川在，她还在我们家给赤卫队唱歌（她是音乐学院声乐系的学生）。有一天起床后，我们突然发现屋子的人都没有了。后来才知道是“工总司”的人来冲过，他们还打了一架。我因为在楼上睡觉，也没看到打架和他们撤退，只觉得外面闹哄哄的（我这个人不大容易惊醒，只听到有很嘈杂的声音，但我没起来）。等我早晨 10 点起来，整个院子都是空空荡荡的。此后，康平路好几天都没什么动静。他们说这一架打得很厉害。接着，我又去串联了。等到 1967 年春节前我回来，上海已经是“一月风暴”之后，中央两报一刊点了



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和杨西光的名。机关造反派对我说，你们这里不能住了。陈丕显家、曹荻秋家、魏文伯家和杨西光家都被赶到了武康路117弄1号和2号两幢房子里。

等我们搬好家，造反派特地在我们的门对面的公寓征用了一间房间，24小时监视着我们（凡进进出出的人，他们都登记，至于有没有拍照，我就知道了）。

紧接着我们4家的父亲，都被带到康平路100弄对面原来荣毅仁的家里。当时除了陈、曹、魏、杨4人外，夏征农也被关过。父亲被关后，母亲在学校被隔离了一段时间后，就送到了干校。印象中，我们3家的母亲都去了干校。而陈丕显叔叔的爱人谢志成阿姨被关到了“少教所”（地道的监狱）。从此以后，我们这些孩子变成了散兵游勇：串联的串联，聚会的聚会。我当时主要活动就是上午睡懒觉，下午开始聚会，每天和南模、上中、五十四一大帮子干部子弟骑着自行车，到淮海路、南京路兜一圈。那时候大家把目标都放到了旧货商店。旧货店里让我们大开眼界，各人也开始发挥各人的特长。那时候在旧货商店，一把进口小提琴只卖十来元钱，杨晓明还买过一把；还有各式各样的手表。也就是那时我们知道劳力士是一类一等，欧米茄是一类二等，还有浪琴、菊花手表等；一套红木家具也就是两三百元钱；还有烟斗，3B牌；以及莱卡、罗莱福莱克斯、康泰克斯、上海牌、海鸥牌等各种相机，当时日本相机是垃圾。旧货店让我们增长不少知识，我们几乎天天去逛，每天差不多下午四点钟回家。

晚上10点后，我们又开始在张xx家里聚会。他父亲是属于比较早结合的干部（张的父亲因为来上海比较晚，几乎什么事都还没干，就已文化大革命了。没有被捕的经历，所以历史清白。造反派抓不到他什么把柄，其父又没有工作上的错误，为了“三结合”的面子所以很早就被“结合”，但他仍然和造反派斗争不息）。他父亲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下班回家就把自己的房门关上，打翻天都不管。我们就是在他家里开始议论“四人帮”，发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言论的。那时候，我们几乎天天晚上去他家（一个礼拜至少4次）。他父亲明知我们在骂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也不管。

有一次杨晓光组织我、李小林、金小华以及他们班的“老头子”张美杰等十来个人骑自行车去苏州的东洞庭和西洞庭。我们早晨6点出发，到下午4点钟才到目的地，我们腰酸背痛，腿都抬不起来。不知道谁提议去泡个澡，没想到一个小时泡下来，浑身酸痛奇迹般地没有了。我们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到了木渎。木渎是一个标准的江南小镇，镇中心其实就是一条青砖路，旁边都是一扇一扇的商店木门，人也不是很多，很清幽。我们挑了一家门面最大的饭店吃饭。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清炒鱼片，肉雪白雪白的，新鲜，好吃极了。在木渎吃完饭后，我们又骑车到东山紫云庵（大概有千年的历史吧）。那个山上全是杨梅树和枇杷树，盛产非常有名的白沙枇杷，个大，色白，核又小，而且肉又甜又嫩。那时候虽然心情不好，但是到了这种地方，才知道祖国江山如此多娇，此地乃是乱世中的世外桃源。那一次，我们整整玩了3天。

“文革”中，我最重要的两个活动，第一是听音乐，第二是看小说。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基本上把能收集到的古典音乐听了个遍。记得我常去李XX家听古典音乐，他们家有很多院子中的老科学家从美国带回来的唱片，有交响乐、协奏曲、歌剧等等，我的音乐启蒙就是在李XX家里开始的。此外，我还看了许多中外古典小说，18世纪古典文学，我能看到的基本上都看遍了。胡XX有能力借很多书，他每借到一本好书，也会借给我看。“文革”前我特别喜欢看现当代的战争小说，如《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等，几乎一本不落；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小说我也全读了个遍。我喜欢战争类小说和侦探类小说，奇怪的是，却没有看西欧国家的古典小说。“文革”后，我最早看的一本小说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系列里面的《高老头》。之后，我将这套系列完完整整地阅读了一遍；接着还

看了雨果写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铁面人》、《九三年》以及俄罗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等。接着梅里美的《卡门》、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羊脂球》，美国短篇小说家杰克·伦敦和欧·亨利的作品以及普希金的短篇小说也浏览了一遍。不过，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本叫《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书。当时看了以后就觉得，我们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几乎就和书里所描写的一模一样，等于就是翻版。“水晶之夜”天天都在上演。

转眼到了毕业分配，当时有三个去向。一是工矿，二是农场，三是插队落户。我父亲魏文伯已经成了“文革”第一大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的一员，成了华东地区有名的“大叛徒”。尽管他不是六十一人中的人，但是他和六十一人都是北平草岚子监狱的难友，也参加了营救六十一人的工作。像我这样的大黑帮、大叛徒子弟只能插队落户。有黑龙江，吉林，内蒙等。我知道内蒙没人报名，我和杨晓光、陈惠民商量一起去内蒙。内蒙是呼伦贝尔盟大草原，游牧区很符合我小时候的理想。学校只有我们三人报名，但他们只批准了陈惠民。理由是呼伦贝尔盟离外蒙和苏联太近，我和杨晓光一去内蒙百分之百投敌叛国逃到外蒙或苏联。最终陈惠民去了内蒙，而我和杨晓光则被人遗忘，没人管了。

赋闲在家的这个阶段，上中（上海中学）的朋友把北京来上海玩和避难的干部子弟带到了我这里。彭小蒙原来我也不认识，她是北京红卫兵的先驱。她们来了以后，和我特别好。王宏生、郭小英还在我家住过，王宏生住的时间最长。彭小蒙的哥哥在上海，他就住在哥哥家里，但活动基本以我这里为中心。和他们在一起，议论的话题也基本围绕着“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我们甚至曾预言“文革”结束，造反派这帮人总归要倒霉的。

我家一直被对面公寓的一队人监视着。事实上，彭小蒙这帮人也早被公安部盯上了。后来公安部和上海公安局一对证，发现我这里是聚会中心，就成立了专案组，一直盯着我们。记得那是1969年的冬天（还没过春节），那天正好下着大雪，彭小蒙他们从北京又来到上海，我把他们刚接到家，公安局就把我们围住了，把我们一锅端。事后才知道，他们早已蹲守多时了。公安局有穿便衣的，有穿制服的，好像还有两个空四军的人，一共十几个人。他们冲进我家，先问我们在干什么？然后让我们一个个报名字，接着让我们下楼，说有车子在下面等我们。其实我有机会逃走的，因为我路熟，而且还是第一个下来，后面没有人跟着。到下面一看，也没见车子的影子。但是我这个人讲义气，不能把朋友甩开了。于是我就站在下面等他们全部下来。后来开来几辆吉普车，我被头一部车子带走了。

我们被拉到了徐汇分局对面的一幢花园洋房里，我就被关在小洋房后面一排附楼靠近厕所边的小房间里，大概有6到8平方米，里面放着一张小床。被关后的两个礼拜没人找你谈话，饭是从徐汇区公安局食堂里打来的。这两个礼拜，我对外面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后来告诉我，我们被关进去的那几天里，公安局一直在我家守候了3天，凡是进我家门的同学和朋友，进一个抓一个。我有一部照相机，好多朋友都会来借，像老友克拉斯，我的同班同学王xx都是因为来借照相机而被抓的。

我在小洋房里一关就是半年多。两个礼拜后，审讯开始了。那天半夜，他们把我弄到3楼一个房间。审讯我的人中有一个50左右岁的空四军师级干部姓姜，另外有两个30岁左右空四军专案组成员和静安区公安局的干警。静安区公安局之所以牵涉进来，是因为彭小蒙落脚点在静安区，而公安局又属空四军军管。他们一见到我，就是一连串的发问：你们怎么认识的？认识以后，怎么会那么好？那么谈得来？你们谈什么？我说我们谈吃吃喝喝，谈过去的生活。见我谈不出什么东西，他们把我再关进小房间，并搬来了一张小桌子，拿给我一叠纸、一枝笔，让我写交代。被他们逼得没办法，我就写了自己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第三帝国的兴亡》翻版的“交代”，并“坦白”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前怎么养尊处优，文化大革命之后怎么被打入地下而思想不通，一直想要恢复自己的天堂，夺回失去的天堂……

我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思来写交代的，他们看完我的“坦白”后，觉得我没写对现在领导人的看法，因此很不满意，说我不老实。为了过关，我又写了江青怎么怎么样，以及对“四人帮”那些人的看法……

5个月过后，我们大概有二十来个人被放了出来。陈小津、彭小蒙、陈格林因态度极端恶劣，拒不交代，对他们实行了逮捕。我和王宏志也属于态度恶劣的，但不过稍微好一点（因为写过“交代”），给予严重警告，继续隔离审查“坦白交代”。其实他们也知道，我们的“交代”，讲来讲去就是这些内容，不可能组织什么武装暴动集团。他们就是为了整你，给你一个教训。

放我出来前，他们找我谈了最后一次话。他们说，经过这次学习班，你态度有所转变，现在可以放你出去了，但是你要响应毛主席号召，赶紧插队落户。我回家后，里委原先一个星期上一次门，看看我究竟有没有插队落户？后来看看我还没走，他们就派人天天上门赶你走。过了两个月，看我还没动静，公安局又出动了。因为不把你赶出去，他们心有不甘。

我妹妹魏晓申是和我一块儿被“一锅端”进去的，那天她恰巧从湖北京山插队的地方回来过春节，没想到就被一锅端进去了。还好她早早放了出来。我出来后给她写了一封信，问她插队的那个地方要不要我？我之所以想去湖北京山，不仅因为那里是晓申下乡的地方，还因为我表姐、表姐夫也在离京山百十公里的沙市。京山是表姐夫的老家。晓申就是投亲靠友去的京山。晓申回信说，你过来吧。于是，我就把关系全部转到京山县永澧公社六一大队二小队。

我到那边插队时，当地已经开始实行招工了，好多知识青年招工的招工、当兵的当兵，都离开了农村。我到后，晓申过了两三个月，就到镇上的工厂做翻沙工了。我们公社有个阮秘书，人非常好，印象中他有50多岁，是公社的知青办主任。他从来不看你出身，凡是能照顾、能走的，他都把你弄走，从不刁难人。他了解我的情况（当然是看了我的档案），对我讲你什么也别想，这个地方没人敢招你当工人，我就是推荐你，也没人敢要你。他告诉我，他已试着推荐过我，但没人敢要。

我插队的京山分南北两部分，京山的北面是大山，基本上是原始森林，连着神农架。我插队的地方，除了我和我妹妹，还有一户北京知识青年，他们是一对夫妻。男的叫林肇昆，女的叫吴丹丹。林肇昆是一个很有修养的男青年，会拉小提琴，文学也挺好的，农活也干得不错。他老婆由于身体不好，基本上不出工。他妻子的父亲是京山人，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很出名的文人，在抗战时期的延安也是名人。

我们住的地方是京山南边的一片平原，主要种棉花、小麦两种经济作物。听村民说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这里的永澧公社开过全国棉花现场会议，他们很是引以为荣。棉花是九、十月份收，小麦是6月份左右收。我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4点半下地，一直干到8点钟左右，然后回来吃饭；9点再去除草、捉虫和打农药；到12点收工，吃午饭，下午4点钟再上班，中间时间很长，因为湖北是个大火炉，天气太热，中午气温可高达40度以上。但从2点钟到4点钟要学习毛选，讲讲生产，休息只有两个小时。

农村干部对我们知识青年还是比较照顾的，从我碰上的两件事就可以看出。第一是灭螺，当初他们把知识青年全部叫去，而且是拿全工分的（一般情况下，知识青年都是拿半工分）。我们在一个农村社办医院的医生带队去灭螺，一干就是一两个月。说实话，这个阶段很开心的，因为全是知识青年，我们一块聊天，一块生活，生活算比较有意思。我想这是公

社干部的照顾，才让我们知青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第二是修水利，京山修水利时，凡是知识青年都得去，过去也是拿不到全工分的，但那次修水利也可以拿到七八个工分。

我和林肇昆是一块儿去灭螺的；造水库我们也是第一批跟先遣队去的。所谓先遣队就是先要为筑堤的大队人马砍柴，为做饭准备柴火。我们提早去了两个礼拜，因为要砍好两个月需用的柴火。先遣队有10人，其中两个女的负责后勤——帮我们烧饭、整理内务；剩下8个人就去砍柴。每次我们必须走20公里的路，到树林比较多的一片丘陵去砍柴。丘陵大概有50米到100米左的高度。连绵不断的丘陵上覆盖着青草，还有稀稀拉拉的树。当地的老乡告诉我们，1958年前，这个地方是一片片茂密的松林，但1958大炼钢铁时全被砍光了，至今生态也不能恢复。我和林肇昆随几个农民一起上山的，农民上山后，都先砍下树做根扁担，看到我们两个人不会做，他们也帮我们做了两根扁担。我们砍得很慢，他们每人砍了80斤到100斤时，我和林肇昆每人大概才砍了20斤。我们想，回去还要走很多路，就挑20斤试试看。走着走着，离前面的农民越来越远，后来完全看不见了。那个地方丘陵和村庄好像都一模一样，我们觉得大概要到目的地时，其实只走了一半路程。下山后，我们碰到了其他的老乡，他们一看我们是迷路的知青，就给我们安排一个地方睡觉。那是一个放两个老人棺材的房间，老乡抱了一点干草铺在两只棺材中间，就算是我们的地铺了。这一晚，我们也没睡好，老鼠整夜都在我们头上爬来爬去。到天亮时，我们已腰酸背痛。我们知道回营地的大方向，所以起床后，继续挑着柴禾往回走。中午时，我们在小卖部买了十根油条当做午饭，差不多到天黑才找到营地。这段路程我们差不多走了一天半。第二天我们两个人没一个人起得了床，想去跟他们上山砍柴也去不了，腰酸背痛，根本不能动。我们两人整整躺一天，到第3天才起来跟他们去。这一次我们不但跟得上，跟着回，而且随着日子时间推移，我们肩上的担子也从20来斤挑到60斤左右。后来大队人马上了水库，我们反倒没那么累了，就是挖土、推车；干的慢一点也不显眼。

因为在京山肯定无望招工，我就转到了黄州。我妹妹晓明那时也从吉林转到了湖北老家。湖北黄冈专区管着老家新洲，这一带的领导对我父亲特别好，经常有人到上海看我妈妈，等爸爸放出来后，他们更关心了，来的也更勤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郭秀莲阿姨，她每年都要来上海看我父亲母亲。后来她听说我在京山，就对我父母说，一定要把我弄到黄冈来，果然她把我弄到了黄冈。黄冈这批干部其实也是年轻干部，都是铁杆的“保皇派”。湖北一批老干部解放以后，除非确实有历史问题的，全部当上了一把手和主要领导，和上海形势完全相反。可以说当时的湖北形势一片大好，全是老干部掌舵。黄冈除了老干部外，就是他们这些铁杆的“保皇派”在中层、低层的领导岗位上，或者就是主要部门的骨干。我去的地方是黄冈专区黄州县的赤壁大队。黄州出门就是赤壁，赤壁大队离赤壁大概两三里路，离专区也只有三四里路。我所在的大队聚集了一大帮子家庭成份不好、没有出路的人，因为受到照顾，我们的工作、劳动都还比较轻松，周末还可以放一天假。

赤壁非常漂亮，江边的岩石上都刻着古人的石刻题词，周边还有亭子。我很喜欢石刻上的字，趁休息的时候，就在那儿临摹。其实在湖北有文武两个赤壁，当年苏东坡被贬到黄州在此做了“赤壁赋”，后人因崇拜苏东坡就将错就错把黄州当作赤壁大战的赤壁，后称文赤壁。湖北嘉鱼才是赤壁大战的地方，后称武赤壁。每次出门我都要到漆大爷、郭阿姨，还有小顾的家里坐坐，他们都对我很好，还经常去郭阿姨家里吃饭。

1973年，开始招工农兵大学生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开心，觉得自己有希望了，因为有这么多个领导干部愿意帮我活动，而我的功课也没什么问题。但是突然下来一个通知，说本届大学生必须要26岁以下。我那年正好27岁，不在招生范围内。我去黄州到赤壁大队前，曾找过我所在公社的阮秘书，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办手续时，他让我自己带档案到赤壁大队。回家后，我把档案袋拆掉看了看，当我发现材料中有反革命嫌疑分子、攻击中央文

革小组、反对文化大革命等公安局整出我的两页黑材料后，当即就撕了它。这样我的档案就清白了。我并没有将档案交给赤壁大队，因为他们也不需要。当通知下来后，我灵机一动，把档案袋里材料上的出生年月一栏中的1947改成了1949。我的年龄问题得到了解决。

我考的成绩非常好，再加上基层推荐以及我父亲和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张德甫叔叔是老战友，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就把我招进去了。进大学读书后，一切运转都比较正常。我每个礼拜都要去张德甫叔叔家里。有一次张德甫叔叔对我讲：“晓台，前两个月发生一件事情，因为怕影响你，所以一直没对你讲。上海市办公厅有两个人到学校，找到我们党委，说是要把你这个反革命嫌疑分子、黑帮子弟退回农村，说你不能上大学，招你是个“错误”。张叔叔对我说，当时党委就对那两个人说，第一，魏晓台是可教育好的子女；第二，他上大学是贫下中农推荐的，各组织批准的，作为校党委没有权利退这个学生。如果一定要退这个学生，权利不在学校，只有省招生办说了算。省里如果下文说魏晓台这个人要退回去，学校就照办。这两个人在学校碰了一鼻子灰后就到省里去了。据张德甫叔叔讲，他们到了省里，也没有人理他们，让他们回去了。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

大学每年毕业生都有上海名额，但是到了我这届却没有上海名额了。毕业那年我养了一段时间的病（插队落户期间，为棉花打农药和灭螺都是剧毒农药。按规定应严格保护皮肤，但我并不在意，卷袖、裸脚、不戴口罩，造成肝慢性中毒），等我回到学校，校领导让我和下一届毕业生一起分配，但我不肯，硬要和我们那一届一起毕业。如果等到来年，我就可以回上海了。而当年我却被分到了广州。

到了广州后，我分在了广州海运局港机科，和毕业于上海海运学院港机系的姓钱的嘉兴人，一同报到的。那是我第一次去广州，本来按规定要下去劳动半年，但他们让我们休息了几天，然后才把我们分到汕头港务局，在机修厂里当机修工，修理铲车和吊车。

广东男人早晨4点多钟就开始饮茶去了，好多人从4点多钟一直坐到晚上。我们没吃过广东的东西，周末时，我们两个人也会去品尝广东的美食。汕头那些工人和我们关系处得非常好，经常要问我们上海的情况。有时他们还把我们请到家里去喝功夫茶。一喝就是两三个小时。大家围坐着，点根蜡烛（那时候差不多家庭每晚都停电），就在那里泡茶、聊天。

这样生活了二三个月。我们一直睡在仓库里，仓库里放了好多双人床（大概是集体宿舍多下来放在里面的），我们就各自找了一个下铺睡。有一个礼拜天，我们正睡懒觉，大概9、10点钟，我听到外面传来很嘈杂的口号声、鞭炮声。我仔细听了4、5分钟，终于听清楚是“打倒四人帮”、“打倒江青”、“打倒张春桥”、“打倒王洪文”、“打倒姚文元”的口号。我赶快拍拍我那个同事，让他快起来。我们穿好衣服，一下子就冲到了街上。那时候，心里真的很开心，因为“四人帮”垮台，父母解放和回上海指日可待了。但我真正回上海却拖了好长时间，因为我父亲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在广州，很多人给我介绍对象，因为大家觉得我父亲不会有太大问题；而且介绍给我的还都是干部的孩子，有部队的，也有地方在职干部的。我告诉她们，自己是“黑帮”子弟，会影响到她们的父母，但她们说，自己的父母都说了，没问题的，不怕。老实说，当时我心理一直想自己不能在外地结婚。第一，我要和父母在一起；第二，我一个人回上海方便，在外地结婚就麻烦了。所以我决定回上海后才找对象。我们科长有一个女儿，她来我们办公室看她爸爸时，看到我后，就对她爸爸说，你们科里面来的年轻人有没有对象？他女儿是桂林的军医，她有一个同班同学和她在一起，是师级干部的孩子，她觉得我跟她的同学蛮般配的，想让我们处对象。那天我们科长把我叫到他家吃饭，就对我提了这件事。我跟科长说，

我在上海有女朋友，只不过因为家庭问题没解决，不能和人家结婚，只能等。我一口回绝了。我们局办公室的有一个干部家庭的女孩对我也挺好，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一次，我们吃完饭坐在珠江边的石头上聊天。她是广州外语学院法文专业毕业的。她对我说，我们局的副局长的女儿很看中我。我立刻说我不敢高攀，怕我的“黑帮”身份影响人家，再说我有女朋友。我也回绝了她的好意。

我回到港机科正好兴起基层教育运动：一个科长配一个科员，到一条远洋船上，科长主要做高级干部的思想工作；科员就是为船员上英文课、文化课。我这个人只要船一进海洋就会晕船。所以船一入海，我就马上爬到了床上躺着。好在广州海运局都是短途（一天一夜最多了），所以我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我曾试着吃过一次，结果当时就全部吐光，以后我就再也不吃了。等到船一靠岸，我马上冲到地下去“吸地气”，只要吸过“地气”，马上就头不晕了。我是靠岸后才给他们上课；不靠岸坚决不上课。因为装货、卸货需好长一段时间，最长可停靠3天时间。

在广州海运局，我有了第一次出国经历。我当时领了海员证，因为我们的船经常要去越南。第一次去越南感到特别新奇，船一进南海海域，他们的领航员就上来了。当时出国，会议室里都会放一盆糖果、一盆水果和两盒中华牌香烟。那个领航员上来后，就将香烟、糖果拿掉装了口袋。那时候出口越南的货物主要以花生、大米为主，而且绝大部分是花生。船到港后，越南搬运工有三四十个人，他们一上来，全部坐在船舱里，半小时不会开工，就在那里剥花生吃。等到吃饱了才干活儿。临到下班前半个小时，他们又会坐下来吃。吃完后，每个人将自己的口袋塞得满满的，有的人还会带一个小袋子装满一袋子。我估计每人身上要装十几斤。他们走后，满仓都是花生壳。我问船员，他们怎么这样？他们告诉我，他们是三班倒的，每班8小时，但国家就只给他们4两面包作为一天的口粮。他们拿花生回家，一是给一家老小吃；二来可以卖出去换点钱。

因为我是第一次出国，船员陪我下了码头。越南码头周围的路边全是地摊，地上就铺块塑料布，卖法式面包、蔬菜、槟榔，还有鱼干等这些东西；日用百货是没有的。到市区里后，我发现街区也是空荡荡的，商店里就一些塑料器具、毛巾肥皂，其他没什么东西。经过一家电影院，我一看贴的电影海报全是前苏联电影。当然也能看到一些中文。那时我对越南的基本印象就是穷，比惨遭文化大革命蹂躏的中国还要穷的多。自从那次以后，再到越南，我也不出去了，偶尔有人要我陪，我就陪他们走一走、看一看。下船时，司务长也买各种各样的鱼干，每个人分一份。我都给船员了，我没地方放，又不开伙仓。

在广州工作的这几年，我几乎每天只用电炉下一碗面，里面打个鸡蛋，或者下点肉丝，放点生菜等蔬菜就算是一顿饭了。读大学时，班上有很多广东同学，我经常会上门，周末一有空就到他们家里串门蹭饭吃。有时我也会自己到外面吃，因为我一出门，就是广州最热闹的商业区中山路。我当初买了一辆自行车，交通方便，再说广州的饭菜也不贵。

1978年，父亲问题解决后被调往了北京。母亲要求上海市把我这个独生儿子调回来。上海市为此发函给广州海运局，海运局复函表示同意。我回上海已是1978年底的事了。回上海后，我基本上过着平淡而平坦的生活。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段生活来说，我作为一个干部子弟和其他干部子弟一样，尽管父母被打倒，但我们的精神和意志并未被打倒。我们顽强地在逆境中生存，在打击中斗争，不屈不挠地在残酷和狭窄的生活空间中努力锻炼自己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进程，同时也考验了我们干部子弟无愧于我们父辈的期望——清清白白做人。

〔作者简介：1964年入上海复旦附中。文革期间，到湖北京山县、黄冈县插队落户。1973年入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港机系，毕业后分配到广州海运局港口科。文革后，调入上海交通大学港机系。曾在港澳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扬子国际旅行社等单位工作。2009年退休。〕

□ 来源：《中学生的文革岁月》第一集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